联合国 A/74/771–S/2020/242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7 March 202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 会
第七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31
预防武装冲突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五年

2020 年 3 月 27 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阿尔扎赫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外交部针对阿塞拜疆歪曲 1992 年 2 月霍贾卢事件事实的备忘录。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1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米海尔·马尔加良(签名)

20-04690 (C) 310320 030420

请回收

2020 年 3 月 27 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阿尔扎赫共和国外交部备忘录

针对阿塞拜疆一再歪曲 1992 年 2 月霍贾卢事件的事实，阿尔扎赫共和国外交部谨通报如下：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阿尔扎赫共和国)国防军的行动旨在消除位于霍贾卢的阿塞拜疆武装部队的炮击和射击阵地，并解放斯捷潘纳克特机场，这些行动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准则和原则。

霍贾卢是一个定居点，距离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首都斯捷潘纳克特 10 公里处。该定居点的位置具有战略意义：它控制着从斯捷潘纳克特到阿斯克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又是附近村庄的连接线。最重要的是，该机场位于霍贾卢附近，鉴于自 1989 年以来实施的全面陆地封锁，它是共和国与外界沟通和接收食品和药品的唯一途径。

为了以武力镇压阿尔扎赫民族解放运动，阿塞拜疆当局将霍贾卢变成了威胁性据点，从那里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实施全面空中封锁，对斯捷潘纳克特进行严重包围，并肆意攻击亚美尼亚定居点。

阿塞拜疆部队使用了被禁止的战争手段和方法，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实施全面封锁并故意阻碍向共和国运送人道主义援助。具体而言，阿塞拜疆的行动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23 条，其中规定冲突国有义务“允许医疗与医院用品以及供 15 岁以下儿童、孕妇与产妇使用之主要食物、衣服和滋补剂自由通过”，还违反了《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70(2)条，其中将这一义务扩大到“所有救济物资、设备和人员迅速和无阻碍地通行”。

1991 年秋，阿塞拜疆部队开始利用霍贾卢作为炮击亚美尼亚定居点，特别是斯捷潘纳克特的发火点。民用场所——医院、学校、房屋和行政大楼——是阿塞拜疆炮击的主要目标。

1992 年 2 月 13 日，阿塞拜疆违反《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51(4)条中禁止要肆意攻击的规定，开始使用 BM-21 型“格拉德”多管火箭炮[1] 炮击斯捷潘纳克特居民区，当时多达 70 000 人聚集在那里。由于这次密集炮击，对斯捷潘纳克特居民至关重要的重要物品被摧毁。来自霍贾卢和其他阿塞拜疆发火点的持续炮击导致亚美尼亚平民大量伤亡。到 1992 年 2 月底，243 人死亡(包括 14 名儿童和 37 名妇女)，491 人受伤(包括 53 名儿童和 70 名妇女)。平民生活在持续的焦虑状态中，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离开家园或避难所。供电和供水的公共分配系统不再运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斯捷潘纳克特的电力、水和天然气供应几乎停止。在 1991-1992 年严冬，斯捷潘纳克特居民被迫躲在无电、无水、无暖气的地下室，被迫忍受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

[1] BM-21“格拉德”多管火箭炮是一种不能瞄准特定军事目标的武器。因此，阿塞拜疆使用它构成了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平民的随机攻击。

全面封锁导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斯捷潘纳克特粮食严重短缺。我们将面粉配给量限制为每月 400 克。在持续的封锁中，已经将许多婴儿和老人因体温过低和饥饿而冻伤和死亡记录在案。阿塞拜疆使用饥饿作为战争手段不仅违反了 1977 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54(1)条，而且根据 1998 年《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 8(2)(b)(XXV)条，这也构成了战争罪，该条款禁止“以断绝平民粮食作为战争方法，使平民无法取得其生存所必需的物品，包括故意阻碍提供的救济物品[。]”

阿塞拜疆实施这些和其他暴力行为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平民中散布恐惧，这种行为直接违反了 1949 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33 条和《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51(2)条所载的禁令。

阿塞拜疆继续全面封锁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故意强加不人道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剥夺获利食品和药品的机会，并大规模使用重炮炮击定居点。这一切是由阿塞拜疆精心策划的针对平民的广泛或有系统攻击的一部分，其战略意图是毁灭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部分特定人口。

在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是消灭霍贾卢射击阵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居民才能实际生存下去，阿塞拜疆一直从那里肆意炮击斯捷潘纳克特平民。此外，为了开辟人道主义走廊，解放共和国唯一的机场也至关重要。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国防军于 1992 年 2 月 25 日晚上 11 时发起霍贾卢行动，并在几个小时内完成。在行动过程中，国防军控制了斯捷潘纳克特机场和霍贾卢定居点，从而防止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发生真正的人道主义灾难。

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基本原则，开展了出于绝对必要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国防军坚持区别和相称原则，以及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尽量减少对平民损害的义务。具体而言：

- 在军事行动开始前几天，卡拉巴赫方面通过无线电通信线路多次通知霍贾卢当局即将发生的袭击，并呼吁他们立即带领民众通过专门为此目的开辟的特定走廊离开该镇。在采访中，时任阿塞拜疆总统阿亚兹·穆塔利博夫和霍贾卢执行委员会主席埃尔曼·马马多夫都证实，阿塞拜疆方面实际上已经收到了发出的袭击警告，甚至已经转达给巴库。前总统穆塔利博夫在 1992 年 4 月 2 日发表在《独立报》上接受捷克记者 Dana Mazalova 的采访中说：“阿塞拜疆方面接到了接管霍贾卢行动的通知，在行动期间，亚美尼亚方面提供了一条走廊，将平民从霍贾卢疏散到阿格达姆地区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马马多夫主席也承认：“我们被告知，该走廊是为了让平民离开[。]”[2]

-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军事领导人向参与这一行动的所有部队下达了严格命令，不得以平民为目标，并保护将被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国防军控制的人。在消除霍贾卢重炮射击阵地的行动中，平民伤亡降至最低。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优势相比，附带的平民伤亡、平民受伤和民用物体损

[2] 俄罗斯思想；报纸，引自阿塞拜疆报纸《巴库工人报》。1992 年 4 月 3 日。

害程度绝不过分。因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国防军的行动符合《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51 条。

- 为疏散平民提供了一条人道主义走廊。事实上，包括霍贾卢地方当局在内的实际使用走廊的人能够安全抵达阿塞拜疆军队控制的领土。
- 大约 700 名迷失方向并随后被卡拉巴赫一方聚集在山区的人在几天内被无任何先决条件地转移到阿塞拜疆。

相比之下，阿塞拜疆方面在上述事件中严重违反了一系列国际人道主义法准则。特别是，

- 阿塞拜疆当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疏散平民。据阿塞拜疆消息人士称，1992 年 2 月 22 日，在穆塔利博夫总统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阿塞拜疆安全理事会会议，总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和其他官员参加了会议。会上，与会者实际上作出了不从霍贾卢撤离居民的决定，认为此举可被视为准备放弃定居点。[3]

为保持军事战略地位不疏散平民这一决定本身就严重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28 条规定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对于被保护人不得利用其安置于某点或某地区以使该处免受军事攻击。”事实上，阿塞拜疆的违反行为相当于战争罪：《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8(2)(b)(xxiii)条明确将“将平民或其他被保护人置于某些地点、地区或军事部队,利用 其存在使该地点、地区或军事部队免受军事攻击”定性为战争罪。

此外，在军事行动期间，霍贾卢驻军的一大群武装军人利用卡拉巴赫方面提供的人道主义走廊混入平民之中，向阿塞拜疆阵地撤退。在穿过走廊时，阿塞拜疆士兵利用平民作为人盾躲避，同时不断向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国防军开火。阿塞拜疆武装部队的这些行动显然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特别是禁止将平民用作人盾的《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51 条。应指出，其中没有战斗人员的平民群体没有拒绝所提供的人道主义走廊，安全地通过了走廊，没有发生任何事件。[4]

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和时任总统穆塔利博夫之间持续的内部权力斗争使局势进一步恶化，这场斗争导致阿塞拜疆武装部队缺乏统一的军事指挥。阿塞拜疆政府军忠于穆塔利博夫，而许多准军事人员隶属于阿塞拜疆人民阵线。这场内部政治斗争的影响巨大；事实上，由于这场斗争，穆塔利博夫最终被推翻并逃离了阿塞拜疆。

遗憾的是，尽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国防军采取了所有保护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预先警告行动和建立人员走廊，但阿塞拜疆方面蓄意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阿

[3] 根据对霍贾卢事件议会调查委员会主席 Ramiz Fataliyev 议员的采访。见 Fataliyev, Ramiz。对阿塞拜疆自由电台的采访。2009 年 9 月 9 日。

[4] 霍贾卢前居民在接受阿塞拜疆记者 Eynulla Fatullayev 采访时证实了这一事实。见 Fatullayev, Eynulla。卡拉巴赫日记。“真实的阿塞拜疆”。

塞拜疆内部权力斗争以及由此造成的阿塞拜疆武装部队缺乏统一指挥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注定会造成人员伤亡。

如上所述，在军事行动期间，霍贾卢驻地一大批武装军人混入平民中，开始沿着卡拉巴赫一方提供的人道主义走廊向阿格达姆(由阿塞拜疆武装部队控制)撤退。一个霍贾卢居民车队与武装人员一起离开所提供的走廊，前往亚美尼亚Nakhichevanik,村，由于阿塞拜疆部队从阿格达姆袭击这个亚美尼亚村庄，那里发动了激烈的战斗。据阿塞拜疆战斗人员回忆，他们向 Nakhichevanik 村进发，因为他们收到阿格达姆的无线电指示和保证，该村已经被阿塞拜疆军队占领。就在离阿格达姆不远的阿塞拜疆武装部队控制领土内，该车队陷入随后战斗的交火中。

应当说明，这一事件发生在阿塞拜疆部队控制的领土内，以下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92 年 2 月底和 3 月初，阿塞拜疆和土耳其记者有机会两次访问事件发生地，并在阿塞拜疆军方在场的情况下对数十具尸体进行了拍照。

在阿格达姆附近的霍贾卢居民不幸死亡后，阿塞拜疆当局立即进行误导和造假，隐瞒发生悲剧的实际地点，并篡改死亡人数数据。事实上，试图对霍贾卢平民伤亡事件进行独立调查的阿塞拜疆记者在阿塞拜疆不是被杀就是被捕。第一个质疑阿塞拜疆官方说法的记者是摄影师 Chingiz Mustafayev，他在 1992 年 2 月底至 3 月初拍摄了霍贾卢居民死亡的地区。在他开始调查的几个月后，他本人于 1992 年夏天在阿格达姆附近被害，情况不明。

15 年后的 2007 年，另一名阿塞拜疆记者 Eynulla Fatullayev 就霍贾卢居民的伤亡提出不同于阿塞拜疆官方立场的观点。他被逮捕并被判处八年半监禁。尽管欧洲人权法院于 2010 年裁决，命令阿塞拜疆立即释放 Fatullayev，但直到一年后，即 2011 年他才被赦免和释放，当时他收回了之前的爆料，并同意与阿塞拜疆政府合作。

前总统穆塔利博夫也获得类似缓刑，他在流亡 20 年后，得到阿利耶夫总统的赦免，并被允许返回巴库。为赦免付出的代价是前总统放弃了他先前在多次采访中就该事件发表的声明，如上所述。

阿塞拜疆的造假活动甚至包括明显歪曲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评估，如欧洲人权法院对 Fatullayev 诉阿塞拜疆案的判决。首先，应该指出，在 Fatullayev 案中，该法院认为阿塞拜疆应对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 10 条和第 6 条负责。

第二，阿塞拜疆声称，该法院认为霍贾卢事件是“特别严重的行为，可能构成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这显然是错误的。该法院在其判决中明确指出，“[法院因此认为，解决与霍贾里事件有关的历史事实的意见分歧不是法院的任务。因此，为了对本案进行分析，法院无意在这方面得出任何明确结论，只限于发表以下意见[。]”

阿塞拜疆方面不仅歪曲了该法院的判决，甚至无耻地伪造自己的历史评估和信息。根据阿塞拜疆外交部 2020 年 2 月的声明，事件发生时霍贾卢人口为 7 000 人。然而，1993 年 4 月，阿塞拜疆外交部向欧安会报告说，当时霍贾卢人口为 855

人。因此，阿塞拜疆外交部 2020 年 2 月的估计与其 1993 年 4 月的具体声明直接冲突。阿塞拜疆外交部在其 2020 年 2 月声明中使人口数字比 1993 年 4 月的同期估计增加了八倍。阿塞拜疆在此案中对数字的明显造假无疑会使它的其他评估和估计变得明显不可靠。

阿塞拜疆继续推行造假和误导方案，利用关于霍贾卢事件的虚假陈述散布反亚美尼亚的歇斯底里情绪，并在阿塞拜疆社会中培养对亚美尼亚人的仇恨。

阿塞拜疆对向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发动战争以及粗暴和系统地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负有全部责任，这一切给被封锁的平民带来巨大苦难。企图指责亚美尼亚方面杀害霍贾卢平民注定徒劳无果。阿塞拜疆的努力只是试图掩盖其对蓄意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及完全无视平民生命的直接责任，这种行为直接促成了这些悲惨事件。